

美评
联社述

邓副总理将访问泰马新三国

马来西亚官员说邓副总理的访问是一次重要的访问

【美联社曼谷十一月三日电】中国进行新的外交巡回演出的地点本周末将移到东南亚，邓小平副总理此行显然是要设法削弱苏联和越南对这一地区采取的主动行动的影响。

最近，一连串的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东南亚，设法把持中立立场的东南亚国家拉入各个大国阵营，邓小平是继这些人之后来到的。

预料，邓小平这次将强调北京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的友好态度，提醒他们注意苏越两国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意图。他的访问是在越中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并有消息说发生了边界冲突以及预计越南和中国的盟国柬埔寨之间的边界战争将加剧的时候进行的。

东盟国家的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指出，中国十分关注它的东南亚侧翼保持稳定，十分关心防止苏联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一些观察家指出，历史上的一些关系和种族的相似有助于发展中国和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这种有利条件有助于把苏联关在这个地区的大门之外。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报》十一月二日报道：马来西亚政府将在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吉隆坡时，谋求中国重申不干预马来西亚内政。

马外交部发言人哈密一日在吉隆坡接见报界时这样表示的。

他还说，我国政府将在邓小平副总理来马时劝请中国购买更多我国的初级产品，如木材、棕榈油和橡胶。

他表示，马来西亚充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目前两国之间的贸易对中国有利。哈密预料邓小平副总理将与我国总理奥恩讨论东盟、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化的概念，区域和国际局势，特别是印支越南和柬埔寨等问题。

哈密形容邓氏的访问是一次重要的访问。

外电评述苏越签署友好合作条约

说对双方会谈进行得如此迅速，签字仪式如此突然举行感到惊讶；认为会谈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

【法新社莫斯科十一月三日电】塔斯社宣布，越南和苏联两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于今天结束。

观察家们对于会谈进行得如此迅速感到惊讶。

【路透社莫斯科十一月三日电】越南和苏联领导人今天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项条约使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亲密联盟正式确定了下来。

苏联塔斯社今天报道了越南所讲的关于中国部队越过边界使越南遭受严重伤亡的消息。

西方分析家预料到这次访问中将签订一项条约，但对于签订仪式如此突然地举行感到惊奇。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月三日电】一个高级越南代表团今天同苏联签订了一项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保证加强和巩固两国间的友好合作，这就使得两天来的克里姆林宫会谈达到了最高峰。

苏联电视采取了异常的措施，中断了晚上的节目来播映勃列日涅

夫主席、柯西金总理代表苏联，越南共产党书记黎笋和总理范文同代表越南举行的签字仪式。

这四个人签字后互相拥抱、接吻。

列席人员中有越南二级将军文进勇、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外长葛罗米柯、克格勃安全警察头子安德罗波

夫以及苏联高级意识形态学家苏斯洛夫。

苏联电视台一位评论员说，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议，这些协议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发展了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

代表团今天结束了会谈，他们听到了越南和中国发生重大边界冲

突的消息。

西方一位高级外交官说，代表团成员中包括越南将军文进勇。这使得这次会谈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这位外交官说，人们认为，这次会谈（苏方也有高级军事代表参加）还研究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越南显然还谋求得到粮食和外汇，来缓和今年由于洪水和暴风雨带来的困难。

这位外交官说，苏联也许想表明，他们也能在中国的后院里搞些什么。

法新社报道越在柬边界上集结十三个师兵力

说东亚的紧张局势危险地加剧了

【法新社曼谷十一月三日电】由于越南指责中国在两国边界上挑起了暴力冲突以及中国宣称中苏战争不可避免，东亚的紧张局势危险地加剧了。

略微改变了一点超然态度的美国，最近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意东南亚和平受到的威胁。

已经正式查明越南在柬埔寨边界上集结了十三个师的兵力。

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主席对越南共产党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说：

“我们象在前两次

冲突（同法国和美国的冲突）中一样是站在你们一边的。”

他还说：“必须挫败一切侵略图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外交官们正设法弄清楚中越边界的“流血”冲突的真正性质。

曼谷报纸报道，在莫斯科的外交人士毫不犹豫地讲越南人是搞“吓唬”手法，以设法从苏联那里弄到最大数量的援助来对付“中国的这一新的侵略”。

越南人的无线电通讯或者在柬埔寨电台上讲话的越南被俘人员已

证实：

越军集结了一师、二师、四师、五师、六师、七师、八师、九师、十师、三二〇师、三三一师，还有十九机械化旅。

消息灵通人士说，其中三个师据信占领了柬埔寨东部一个小小的狭长地带，另有三个师在柬埔寨北部的上丁省。

这里的权威人士说，美国代表詹姆斯·伦纳德在联合国的讲话称美国政府对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感到忧虑，这反映了这个地区各国首都的心情。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十一月号刊登寄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略谈中国大陆的浪费》，摘要如下：

考察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除了长时间的政治上不稳定、闭关自守、生产效率低和忽视经济核算等等多方面的环节外，还有一个不容低估的因素，那就是——浪费！

在国内，浪费现象之普遍，数量之巨大，实在令人发指。以笔者一孔之见，约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曰：“计划不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国家的统一计划。然而，往往国家或地方的计划部门对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采取极不慎重的态度，不经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权衡利弊得失，只凭主观臆断草率从事，以致造成浪费。有的工厂，投建前不考虑原料、运输、水电等多方面问题，及至问题暴露了，欲罢不能，勉强从事，结果影响生产，得不偿失。

二曰：“大慷国家之慨”。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各级机关、基层单位，大盖厅堂楼阁，虽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仍肆无忌惮，巧立名目，糜

资无数，毫不心疼。报载旅大市委受处分事便是一例。笔者曾亲眼见一不足一千职工的企业，竟然修建一座有一千多个座位的设备奢华的电影院。有的单位购置机器仪器及各种用品，因长期搁置，终成废品。

三曰：“建设不足，破坏有余”。有的领导为标新立异，不惜以国家资产作试验。如某省负责人为表示狠抓“粮食产量跨纲要”，竟下令经济作物产区改种粮食，然而究其所得微乎其微。

四曰：“事故不少”。由于规章制度的不健全和各种生产设施的不完备，往往造成事故。重大事故不仅造成损失，而且影响极坏。

五曰：“质量难保”。因产品质量不好造成的浪费是显而易见的。《人民日报》报道的电视机质量问题便是一例。有的厂房、宿舍或机器安装因设计不妥，施工马虎，往往被迫翻工或造成使用年限大大缩短。产品质量的不过关势必造成材料与工时的极大浪费。

港刊文章《略谈中国大陆的浪费》

说在大部分领导和群众的思想里，对于浪费的危害，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六曰：“人力使用不当”。最大的浪费是人才与劳力的浪费。在中国大陆，一方面是文教科技人才的青黄不

接，另一方面是各种优秀专业人才的学非所用。因生产组织不当、生产工具落后而造成的劳力浪费更是普遍存在。有的基层单位任意增加非生产人员，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某一不足二百人的小企业，竟设一人专管播放电视。

尽管中共领导人以至毛泽东本人都不仅一次地强调过节约的重要意义，批判大手大脚办企业和不爱护国家资产等浪费现象，然而，在大部分领导和群众的思想里，对于浪费的危害性，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大约没有人统计过以往的浪费总数，但只要对中国大陆情况稍有了解的人，便会知道那绝不是一笔小数目。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比较贫穷、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水准低的今天，这种浪费，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要纠正这一流弊，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若问良策要出，则中国大陆自有明智的人在。笔者用意，无非提出问题，以为引玉之砖。

就邓副总理访日 美报评中美关系《中国的革命性改革的设计者》

说白宫有一些迹象表明，卡特将在明年初就中美关系采取行动，但美苏核协议问题会有激烈争论，可能推迟采取行动的时间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三十一日刊载蔡尔兹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革命性改革的设计者》，摘译如下：

他看上去不象是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他有一副爱打趣的笑容和矫健的身材。然而毫无问题，中国的这位副总理邓小平，是一个也许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里发生的革命性改变的主要设计者。

他通过访问日本再次证明，访问日本是为了批准这两个迄今因战争而隔阂的亚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和约。

邓决心要把由于文化革命以及江青和四人帮的严格的、过分简单的共产主义而丧失的十年时间追回来。几乎每天都有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争取在实现现代化

苏中亚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二日电】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时间二十二时四十九分在中亚阿赖山盆地发生了烈度为八至九度的地震（按十二度烈度表计算）。

【美联社莫斯科十一月二日电】苏联塔什干地震台一位发言人

说，中亚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东南面三百五十公里一个人口稀少的山区今天发生了一次地震，这是苏联近年来发生的最强烈地震当中的一次。

发言人说，这次地震在麦氏十二度烈度表上为九度。

塔斯社播发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四日电】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全文播发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从两国之间的现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为依据的全面合作、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的紧密兄弟关系出发；

坚信，全力加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兄弟团结和一致的事业的；

遵循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宗旨、为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保证最有利的国际条件的愿望；

确认，双方认为互相协助加强和保卫两国人民用英勇努力和忘我劳动的代价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是他们的国际主义职责；

坚决主张一切为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力量

表示要促进加强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对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和互利合作作出自己贡献的坚定决心；

致力于继续发展和完善两国的全面合作；

认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相互关系的条约法律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和国深为不满。

白宫有一些迹象表明，卡特总统将在明年初采取行动。但在参院批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一事上会有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这可能进一步推迟总统采取行动的时间。

邓象他在与我谈话时所表明的那样，希望购买美国的先进技术。据说，中国向美国公司提出的两个要求，由于华盛顿的命令而被拒绝了，因为购买的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可能涉及军事用途。

就象邓所说的，美

塔斯社报道《美元失去信任》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二日电】题：美元失去信任

马斯连尼科夫今天在《真理报》上写道，最近几天在世界外汇市场上出现了美元汇价猛跌的情况。

作者指出，美元不断贬值的原因是由于进口石油的大笔开支和维持国外军事基地费用所引起的美国收支差额几十亿美元的赤字。据财政专家估计，现在在美国国外流转的美元约六千亿，美国金库早已不能保证这笔美元的兑换

国确实已放宽了一些，允许购买一种先进的地质勘探仪器。

由于美国的政策而造成的长时间隔绝状态，所以很难知道邓所计划的革命的范围如何。数以千计显示出自己的才能的中国学生被送往西方的大学和技术学校。这是最彻底地摆脱过去十年的政策的作法了。

许多敦促同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人都提到日本的方式。一旦美国同台湾断交和美军撤离后，就设立一个贸易处，作为处理美国同这个岛屿的广泛贸易关系的联络机构。然而，由于台湾在美国有一个强大而坚持不懈的院外活动集团，所以要这样做并非易事。

汇价了。

但是，华盛顿官方显然并不反对利用跌价的美元来扩大美国商品向自己竞争对手市场的出口。美元贬值使波恩、东京、伦敦和巴黎比华盛顿本身感到更大的不安，这并不是偶然的。美元汇价下跌开始影响到美国同它的西欧伙伴、首先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的政治关系。看来，这也就促使华盛顿昨天宣布采取一系列旨在稳定美元的非常措施。但这究竟能帮多少忙呢？

将促进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发展科学和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报纸、广播和电视、保健、环境保护、旅游、体育运动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广泛联系。双方将鼓励发展两国劳动者之间的接触。

第四条 缔约双方将全力始终不渝地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兄弟关系、一致和团结而斗争。双方将竭尽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将对发展和捍卫社会主义成果作出积极贡献。

第五条 缔约双方今后仍将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作出一切努力，将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切阴谋诡计，支持为彻底根除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支持不结盟国家的斗争，

美报评卡特为支持美元而宣布采取措施

《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行动是有意识地冒一九七九年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一月二日刊登该报记者罗恩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行动是有意识地冒一九七九年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摘译如下：

卡特总统昨天为了支持美元而宣布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行动简单来说就是：他有意识地冒一九七九年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认为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

布鲁金斯学会和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资料征集公司的民主派经济学家佩里和奥肯昨天都说，卡特的计划使得明年几乎肯定会出现经济衰退。

佩里和奥肯认为经济衰退在明年春季就会出现，失业率现在是百分之六，到年底就会增加到百分之七。他们还认为这种经济衰退可能是轻微的，很快就会结束。

这样的时间对卡特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他显然希望在一九八〇年选举之前经济下降的趋势能够结束，经济重新上升。

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费尔纳昨天警告说，任何勒紧裤带的计划要起作用，至少要实行三年。除了一切其他方针外，卡特昨天所采取的措施也许是可以取代对工资和物价进行全面控制的唯一办法。卡特是不愿意用对工资和物价进行全面控制来作为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的。政府高级官员承认：

“当你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总是会有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危险的。”但是当上星期五第一次把整个计划送到卡特的桌子上时，他就同意了这项计划。当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舒尔茨私下表示，经济衰退造成的风险不会“很大”。

几周来，政府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说，大规模干涉市场是没有用的。他们说，一旦商人们和投机家们认识到美国的经济的“基本状况”是强有力的，美元自身就能调整。

这个一揽子计划是自尼克松在一九七一年使美元同黄金断绝联系以来，为保护美元所采取的最彻底的措施，这个计划等于是完全改变政策。

前总统约翰逊的顾问埃克斯坦说，在总统发表声明之后，他的资料征集公司的预测已改变为会出现经济衰退了。

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巩固独立、捍卫主

权、争取自由支配自己的自然资源、争取确立新的、摆脱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将支持东南亚各国人民渴求和平、独立和相互合作的愿望。它们将始终不渝地主张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扩大和加深国际关系缓和的进程，从各国人民的生活中最终消除侵略和掠夺性战争，以利于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

第六条 缔约双方将就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题相互进行协商。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的目标或受到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相互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和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

全。

第七条 本条约不涉及有它们参加缔结的现行双边和多边协定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第八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于批准书交换之日起生效，批准书的交换将于最近期间在河内市举行。

第九条 本条约有效期为二十五年，如果缔约双方中没有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十二个月内发出通知声明希望条约停止生效，则自动顺延，每次顺延十年。本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在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俄文和越文写成，并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列·勃列日涅夫、阿·柯西金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黎笋、范文同

日报电讯 《胡志明市在建立“秩序”》

说越南政府最头痛的是如何使三百七十万市民生活下去，配给市民的大米一个月才九公斤，这对越南人来说这是痛苦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五日刊登自胡志明市发回的一则电讯，标题是《胡志明市在建立“秩序”》，摘译如下：

自今春开始根据促进越南南方社会主义化这一紧急措施实行胡志明市的商业国营化，到现在正好半年了。企业家和资本家们都感到绝望和丧失信心。另一方面，一般市民则按照新政策，夜以继日地建设迄今从未经历过的“新社会”，旧西贡将变为名副其实的“胡志明市”。

贫民街的变化 时隔两年再次访问胡志明市，清楚地看到街道非常整洁、井然有序。使人感到解放后一段时间存在的那种不安、紧张和混乱的局面现已消失，出现了稳定的气氛。但是，旧西贡特有的那种喧嚣和这个城市特有的人们不理睬交通规则随便走路的盛况，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没有变化。不过，在街上女交通警察不断吹哨子，教育人们要遵守“秩序”。政府毕竟是政府，正拼命想把“社会主义”引进经济社会生活中。

解放后，关闭的饭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八月十四日发表《墨西哥的石油富源》一文，摘译如下：

墨西哥暑气熏蒸的塔巴斯科州的密林的面目将永远地改变了。极大的卡车在塔巴斯科州的农村公路上来往奔驰，天空被天然气的火焰照得一片光亮。许多热带动物，从慢吞吞流向墨西哥湾的夸萨夸尔科斯科河的两岸逃走了。来代替它们的是成千成万墨西哥人。在这个州过去悠闲沉闷的首府比利亚埃尔莫萨，每天都有一批批的新工人到来，商人也跟着来了。住房稀少，物价飞涨，空气兴奋激动，然而却不是轻松的。

塔巴斯科正处在随繁荣而来的痛苦的过程之中。这种繁荣是墨西哥现代的宝藏——石油和天然气带来的，两者贮量之大也许是西半球之冠。据国营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墨油）说，现在已经查明的石油藏量有一百六十亿桶，也许有三百一十亿桶，大部份在塔巴斯科州和附近的恰帕斯州的雷福玛油田。但是这仅仅是开始而已，光在去年一年，墨西哥就发现了二十六处新的油气田——如果坎佩切湾大有希望的构造能打出油来，墨西哥未来的石油富源可能超过一千二百亿桶——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一大堆痛苦：墨西哥领导人决定用新发现的能源财富来把他们的

店、茶馆等人们聚集的地方也开始营业，座无虚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人聚居的堤岸后面的贫民街发生了变化。恶臭闻不到了，令人感到这条街就象住宅街一样。一打听，据说，有一万人已从这个地区迁到旧西贡北部的小河去建设新经济区了。

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 一言以蔽之，从西贡改为胡志明市，就是实行“越南化”。在越南人的国家实行越南化，这话听起来也许感到可笑，但是，越南南方的这个中心地的经济实权被中国人掌握了一百几十年。西贡政权时代，曾枪毙过一位很有影响的华侨。但是，控制着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华侨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要不流血地使这些顽固的华侨资本家同意实行越南化，越南政府必需用行动表明：无论如何也要控制经济实权。从商业改造来看，有大商人和中商人三十六万户，但只是要全部没收帮助过旧西贡政权的大资本家的财产，并禁止他们经营。对于其他一些人，则用增加百分之十的价格的方法收购他们的库存品，除家

庭生活的日用器具以外，其它一切财产都进行登记。这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大量流入黑市的物品终将会被制止。

据说，小商贩有七十万。政府号召他们从流通机构直接转到生产机构。据说，政府的真意是：“小商贩虽然也想实行公营化，但政府要尽量避免发生摩擦。”

合并为农业合作社 政府最头痛的是如何使三百七十万市民生活下去。配售给市民的大米一个月才九公斤。这对靠大米生活的越南人来说这是痛苦的。为了增

美联社说越南最近反华宣传高涨 旨在抵销邓副总理访问东盟三国的影响

【美联社曼谷十一月三日电】越南今天要对两国之间本周发生的一场战斗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越南方面说，在河内东北约二百零四公里越南高谅省发生的这场战斗中，有许多越南人死伤。

西方和泰国的分析家并没有注意到最近有象河内所说的中国军队向越南边境大批调动的情况。据信，中国大部

加生产，减少吃闲饭的人口，在解放后三年间，让七十万市民迁到了农村。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

今后还要让更多的人迁到农村去。到今年六月，政府组织了约六十个互助组，到一九八〇年，要使胡志明市周围的大多数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但是，据说，农业合作社还处于试办阶段。在北方实行合作化花了十年的时间，因此，要解决这个最大的课题，还将花费很多时间。对于不愿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的越南人来说，抛弃故乡是痛苦的。但是，政府正组织青年突击队起带头作用。南方经济改革的关键仍然在于是否能按计划建成合作社。解放后难办的问题堆积如山，这一点现在依然如故。

队驻扎在离边界最近不超过大约六十四公里的地方。越南星期五的广播说，“中国在越南北部边界和南部边界的活动无可抵赖地证明了他们的大国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意图。”

这里的一些注视印度支那问题的人推测，越南最近反华宣传的高涨，可能是为了抵销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出访东南亚三国的影响。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一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伊朗国王得到美国给予支持的保证》，摘译如下：

卡特政府除了越来越紧迫地对伊朗局势表示了一系列的关注外，昨天又向伊朗国王保证美国将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并且敦促他继续实行改革。这种改革已经引起了不断扩大的反对他的统治的骚乱。

卡特总统和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分别发表的声明反映了美国政府内一种不断加深的印象，即巴列维国王的政府有失去对伊朗的控制的危险。伊朗由于它的石油以及它与苏联接壤和处在波斯湾旁的战略位置，是个极其重要的国家。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描述伊朗自一月份爆发抗议示威以来的局势时说：“局势正在继续恶化。不管你怎么说，它正在恶化，恶化，恶化……。军方现在是不听话的。他们认为他们并未从国王那里得到非常明确的信号。”

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政府一些负责对外政策的官员在最近一些汇报中一直强调出现了伊朗国王被推翻的危险。卡特昨天在向伊朗国王的儿子礼萨王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国务院一再作出保证，但是美国官员明显感到担心的是，日益蔓延的动乱局势可能发展到军队的力量无法控制的程度。

华盛顿十分关注伊朗的动乱，一部分原因是这位伊朗国王在这个地区所发挥的军事作用越来越重要，和他作为这个与苏联有一千五百英里边界的国家的首脑执行了坚定不移地亲西方方针。

这位国王在过去十年中和美国签订了购买价值一百多亿美元的武器的合同，其中包括美国武库中最先进的作战飞机。他购买了这些武器，已使他成为波斯湾地区最有力量的统治者——如果他被他推翻，不管谁会接替他，都会同样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力量的统治者。

伊朗的石油也是美国感到关切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每天从伊朗进口约九十万桶石油，相当于美国每天消费总量的百分之五。然而，预料目前的罢工几乎不会立即影响到美国的供应。

美《新闻周刊》文章《墨西哥的石油富源》

说墨西哥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贮藏量也许是西半球之冠

国家从一大堆社会和经济痛苦中解救出来，这样做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但是，石油是否能起到这个作用却全然不清楚。光说一点吧，墨西哥自己似乎就拿不准，开采自己的宝藏，用什么办法最好。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说过，油田开采得太快最终可能造成长期的灾难。他最近警告说，“这种千年难遇的机会在历史上只能有一次。我们必须把不可再生的资源变成永久的财源。”但是，与此同时，洛佩斯·波蒂略已经指示墨油尽快扩大生产，照墨西哥官厅的机构膨胀和效率低下的情况来看，墨油成功的希望只有一半。此外，墨西哥现在正在同美国争吵，美国是墨西哥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天然顾主，要解决引起它们争吵的问题，大概快不了。

墨西哥对美国的猜疑根子很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防备当地反对把石油卖给美国的人阻拦开采石油，甚至秘密订好了攻占墨西哥油田的计划。到了一九三八年，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顶

点，墨西哥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把石油工业收为国有的国家，并且把美国佬一脚踢了出去。

资本大量外流：在以后三十年里，墨油拒绝接受美国人的任何技术指导，墨西哥的石油产量一直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到了一九七三年，国内对石油的需要此刻已经超过了墨油的生产能力。墨西哥不得不进口石油。因此，当石油输出国组织把世界油价提高三倍，使全世界的经济趋于衰退时，对墨西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当洛佩斯·波蒂略在一九七六年就任总统时，他证实了墨西哥的石油储藏量比以前报道的要大得多。最初，新总统想恢复经济的稳定，采取的办法之一是抑制公共开支的增长，他结束了把财产分给无地农民的传统做法。接着，他开始亲自来“管墨西哥的进步”，从石油富源开始，指示墨油增加生产和出口。反过来，墨油也制定了一项二百亿美元的宏伟的扩建计划，要求原油的产量从每天一百三十万桶到一九八〇年增加到至少二百二十

万桶。按照这个计划，墨油还要把炼油能力提高一倍；修建新的天然气净化厂来生产氨和甲烷，铺设管道，把石油产品运送到全国各地。墨油经理豪尔赫·迪亚斯·塞拉诺说，石油“将不仅仅使墨西哥长久繁荣，而且使它成为一个富国”。

前景可疑：达到这个目的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由于墨西哥向外国借了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债款，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按人头平均的收入大约为八百七十五美元，但是，在全国六千五百万人口中，还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却控制了国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墨西哥尽管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绝大多数人仍然是不识字，不够吃，住房条件也很差。失业率现在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惊人程度。

甚至墨油的一些负责人也认为，由于石油生产和建设中的石油化学工业都是高度自动化的，因此，这两个行业对解决墨西哥的失业问题起不了多大作用。

赞成洛佩斯·波蒂略的计划的人们说，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以后就能够产生足够的资本来使全国的经济得到大发展；到其他工业在用石油赚来的钱的扶植下扩大起来以后，就一定可以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来。但是，前景却有点可疑。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科尔曼的访华观感

说苏联总是夸大自己的成就，不谈缺点，而中国人则指出自己的问题；两个国豪的社会都是“封闭社会”；中国现在派大批人出国学习，说明他们多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建设；苏联领导集团正在为保持现状而挣扎着，中国的变化却是如此广泛，如此迅速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十月三十一期刊登一篇特稿，题为《中国改变方向》，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与日俱增，最近去的人当中有本刊记者弗雷德·科尔曼。科尔曼的访问之所以非同一般，因为他是本刊驻莫斯科分社的社长。他从莫斯科直接乘飞机飞往北京。这次访问使科尔曼有可能对中国自从两年前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作出估计，以第一手资料对这两个敌对的共产党强国进行比较。以下是科尔曼的报道。

在北京一个公园里，一位偶然碰到的中国人问我：“美国是如何实行粮食定量的？”我回答说：“我们的粮食不定量。”这个人说：“我不相信。”他说完就走开了。

其他中国人在这样的邂逅中比较耐心，但是他们也提出这样一些甚至更为幼稚的问题——“你们的老人缠足吗？”“美国的农民想进城就可以进城吗？”由于中国社会是关闭性的，因此，这种不信任，甚至于无知，也并不怎么令人吃惊。然而，可以问这些问题却是说明毛泽东去世后席卷全中国的惊人变化的迹象之一。

同中国官员谈话比同普通市民接触更令人吃惊，尤其是对习惯于同俄国人打交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苏联当局总是夸大他们制度的成就，不谈缺点，攻击西方的毛病来转移对他们的批评。而中国人则指出自己制度的问题，表示他们是多么需要同“外国朋友”合作。我在北京郊区参观的一个农业公社的主任解释说，这个公社只有三分之一的麦子和二分之一的水稻用机器收割。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联合收割机，更多的喷灌机械。中国可以制造这些机器，但是数量不够。有些机器的质量也不太好。”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现在，中国各级官员都滔滔不绝地批评他们自己的党犯的错误的。他们讲话时用的是一听就明白的代号，他们先是谴责所谓的“四人帮”，然后又转向林彪。

在中国的两个星期中，我看到的仅有的佩戴毛像章的人是外国游客。这位主席的语录小红书成排成排放在书店的书架上卖不出去。甚至连红卫兵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名叫雷锋的象征目标坚定的人物。

党内现在正在辩论以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为样板的范围很广的经济改革。如果实行这种改革，那么他们就要把相当大的权力交给当地官员和经理。中国现在决心谋求外国帮助，到二〇〇〇年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中国人雄心勃勃地扩大了从日本和西方的技术进口，指望用沿海石油来帮助偿付这些交易。

驻北京各国大使馆已接到中国每年要派出一万名大学生出国的计划，这很可能是以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为首的新领导迄今为止采取的最重大的决定。看来这个决定同重新强调生产有直接的关系。在四人帮的全盛时期，中国要技术人员听从意识形态突击大军的命令，这种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派出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学理科或技术专业的）将冒着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受到

严重的文化冲击的风险，同他们的日本、欧洲或美国同学生活在一起。

四十多年前曾有大批大陆中国人到西方去学习，就象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一样，其中有许多人回国后参加了共产革命。中国人感到不得不让他们数以千计的最出色的青年去接触西方，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多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建设。

中国的变化如此广泛，如此迅速，游客从北京到上海的一路上都可以亲眼看见，即使是在安排周到的正式访问中也可以看到。

北京是个外貌暗淡、尘土很大的城市，人们关在院墙里悄悄地生活。今年夏季，外交官们看到有人穿长到膝盖以下的怪裙子。可是北京大部分居民仍然穿不分男女的毛式服装。这座城市是保守的，那里的变化来得很缓慢。

对比之下，上海则是个熙熙攘攘的港口，生活是公开的，一到晚上，小巷子里飘着刺鼻的大蒜味。南京路上处处可以看到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裙子，甚至于烫发的人也不少。妇女不化妆，也不戴首饰。但是，女性的打扮肯定又重新流行了。年轻男人开始留胡子，戴墨镜，留长发，年青男女公开手拉着手。

看来，自从毛去世后，中国生活中其它方面的变化在这两个城市中也同样出现了。文化解冻使人们可以更多地接触西方思想，中国的传统艺术也恢复了。大约有五十部西方古典作品——其中有《堂·吉珂德》、《福尔赛世家》以及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已经翻译发行。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增多了。这些影片往往是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的影片——而最近从墨西哥进口的一部片子让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式的接吻。北京和上海的电视台每天晚上播送英语讲座；比较大一点的饭店的工作人员围坐在每一层楼的电视机旁，模仿教员的牛津口音。

当江青统治文化界时，上演的文艺节目只限于八个样板戏。现在，著名的京剧团又可以演出以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传统剧目了。省里的剧团也在巡回演出各种男女相会的小剧。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连续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特色。中国人还是彬彬有礼的主人，对外国客人始终是微笑的，非常有礼貌。这对于从莫斯科去的访问者来说，是一个尤其令人感到不同的变化。俄国人在争论问题的时候很粗鲁，或者侮辱人。中国人的方式是用最友好的态度巧妙地表示不同意见。

但是，每当中国人认为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发表强有力的讲话。目前，主要的抨击目标是四人帮，看来，大多数人对文化革命中的过火行为的反感是完全出自真心的。在医院、公社和工厂也一再可以听到人们诉说那些借口保持革命的纯洁所造成的破坏的事情。

在毛逝世之后，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表明要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只是到现在，人们才开

始私下通过在北京的消息灵通外交人士（华主席前不久访问的东欧国家的外交官）了解到这种变动的规模。他们说，在毛执政时失宠的前官员现已恢复了名誉。

一位党的官员把这些归因于中国的制度比苏联优越。他说：“毛主席宽容了他的敌人，毛懂得人头上不象韭菜。如果你把它们割了，它们就再也长不出来了。这是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教训。”

人们一定会以怀疑的态度接受这些说法。因为在上面所谈到的这一时期的很多时间里，中国是没有审判的，因此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官员丧失了生命。我想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想法难免是主观的，而且多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是封闭社会，因此要进行明确的比较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得到能够对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的相异和相同之处进行第一手研究的难得的机会，所得到的印象看来总是值得报道的。

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力量方面将仍然领先于中国。在中国，我曾两次看到人民解放军部队学习怎样拿步枪和扣扳机（没有实弹）。大多数俄国人都有电冰箱和电视机。大多数中国人则没有。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骑自行车上班。然而在有些方面中国人比苏联人强些。尽管中国实行粮食定量，但是中国大城市的商店和饭馆里的鲜肉、水果和蔬菜比俄国的要多。俄国人的粮食不定量，但新鲜食品往往也不多。在莫斯科，轴线和手纸经常缺货，而北京随时都能买到。中国制的避孕药在百货商店免费供应，品种和质量显然都超过了流产仍然是节制生育最可靠办法的俄国。

中国人的笑容比俄国人多，但是，这只有比我的经验和社会阅历更丰富的人才说得上中国人是不是感到比俄国人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大街上从来看不到一个醉汉（而在莫斯科却是司空见惯的），虽然中国人喜欢喝啤酒、葡萄酒和象伏特加一样烈性的茅台酒。俄国的离婚率高，中国的离婚率低。

当然，在这两个马列主义社会里，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的官员都说年轻人不信教。这两个政权都把外国人隔离在住宅区里，派武装警卫守门，不让当地人入内。两国都为党的官员提供特权享有的东西。外国人认为，中国提供给官员的特权不及俄国的吸引人，但是肯定有。今年夏天，有一对加拿大夫妇在北戴河难得地遇见中国高级官员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些青年人穿的是西式服装，用的是西德制的银质打火机。

中国人承认，他们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有些问题是一九四九年以前遗留下来的。他们也不能排除出现又一个被一批新的激进派所破坏的时代的可能性。在莫斯科，苏联领导集团正在为保持现状而挣扎着。北京由于在国内实行了广泛的改革以及实行创新的向外看对外政策，正变得越来越大胆。访问者的思想上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新上任的、比较讲求实际的领导集团是否能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以及避免重犯中国自己不久前犯过的错误。

路透社评中国的外语教学

【路透社北京十月二十三日电】为了使自己的现在比较向外看的国家加速现代化中国人下定了决心，要真解决好掌握外语的问题。

中国计划派数以千计的理工科学生出国，而过去是只派很少出去的。它已向好些西方国家国家洽谈这件事，许多国家，例如西德、英国和荷兰已经同意接受中国学生。虽然许多中国学生被派到国外学习，但是他们的准备还需要大大改进。北京的一位外语教师在提到一些去西德的学生时说，这些学生的德语程度实在太差，以至在饭店里要杯啤酒都不会说。然而，在国内打破外语障碍的工作已经开始。

北京电视台向全国转播英语教学，证明了业余讲座特别受欢迎。英语是中国最普遍的外语课，其次是日语、德语、法语和俄语。

仅仅在首都就售出一百多万册北京电台业余英语讲座的课本，安徽省卖了八十多万册。江苏省卖了将近七十万册。

好学的读者现在还有很多书可以看。最近在这里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安徒生童话》、《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和《莎士比亚全集》。今年上半年，大约有九十名外国专家来到中国教授各种课程，从物理到阿拉伯语。

毫无疑问，他们很受欢迎。美国的语言学家蒂莫西·约翰斯到武汉给四百人做报告，由于听报告的人很多，只能在电视上讲，但还是有许多事情要做。三年内，中国将每年邀请一百个外国教师，现在已经编写了两套外语教材。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怎样解决把文件和蓝图从外语翻成中文的简单翻译。

例如，把一家工厂根据特许生产某些复杂机器所需要的大量资料翻译出来，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官员和工人研究这些翻译过来的资料又要六个月的的时间。

过去是不鼓励中国人同外国人交谈的。现在，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高兴地截住访问者，同他们进行某种直接交谈的练习。

陪同外国人到各地去的中国旅游翻译也急于提高最口语化的词句。这种对待外国人的气氛比较轻松，思想比较开阔的态度会造成一些愉快而又自然的接触。但往往是尽管双方都有世界上良好的愿望，障碍还是太多。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科尔曼的访华观感

说苏联总是夸大自己的成就，不谈缺点，而中国人则指出自己的问题；两个国豪的社会都是“封闭社会”；中国现在派大批人出国学习，说明他们多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建设；苏联领导集团正在为保持现状而挣扎着，中国的变化却是如此广泛，如此迅速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十月三十一期刊登一篇特稿，题为《中国改变方向》，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与日俱增，最近去的人当中有本刊记者弗雷德·科尔曼。科尔曼的访问之所以非同一般，因为他是本刊驻莫斯科分社的社长。他从莫斯科直接乘飞机飞往北京。这次访问使科尔曼有可能对中国自从两年前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作出估计，以第一手资料对这两个敌对的共产党强国进行比较。以下是科尔曼的报道。

在北京一个公园里，一位偶然碰到的中国人问我：“美国是如何实行粮食定量的？”我回答说：“我们的粮食不定量。”这个人说：“我不相信。”他说完就走开了。

其他中国人在这样的邂逅中比较耐心，但是他们也提出这样一些甚至更为幼稚的问题——“你们的老人缠足吗？”“美国的农民想进城就可以进城吗？”由于中国社会是关闭性的，因此，这种不信任，甚至于无知，也并不怎么令人吃惊。然而，可以问这些问题却是说明毛泽东去世后席卷全中国的惊人变化的迹象之一。

同中国官员谈话比同普通市民接触更令人吃惊，尤其是对习惯于同俄国人打交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苏联当局总是夸大他们制度的成就，不谈缺点，攻击西方的毛病来转移对他们的批评。而中国人则指出自己制度的问题，表示他们是多么需要同“外国朋友”合作。我在北京郊区参观的一个农业公社的主任解释说，这个公社只有三分之一的麦子和二分之一的水稻用机器收割。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联合收割机，更多的喷灌机械。中国可以制造这些机器，但是数量不够。有些机器的质量也不太好。”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现在，中国各级官员都滔滔不绝地批评他们自己的党犯的过错。他们讲话时用的是一听就明白的代号，他们先是谴责所谓的“四人帮”，然后又转向林彪。

在中国的两个星期中，我看到的仅有的佩戴毛像章的人是外国游客。这位主席的语录小红书成排成排放放在书店的书架上卖不出去。甚至连红卫兵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名叫雷锋的象征目标坚定的人物。

党内现在正在辩论以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为样板的范围很广的经济改革。如果实行这种改革，那么他们就要把相当大的权力交给当地官员和经理。中国现在决心谋求外国帮助，到二〇〇〇年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中国人雄心勃勃地扩大了从日本和西方的技术进口，指望用沿海石油来帮助偿付这些交易。

驻北京各国大使馆已接到中国每年要派出一万名大学生出国的计划，这很可能是以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为首的新领导迄今为止采取的最重大的决定。看来这个决定同重新强调生产有直接的关系。在四人帮的全盛时期，中国要技术人员听从意识形态突击大军的命令，这种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派出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学理科或技术专业的）将冒着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受到

严重的文化冲击的风险，同他们的日本、欧洲或美国同学生活在一起。

四十多年前曾有大批大陆中国人到西方去学习，就象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一样，其中有许多人回国后参加了共产革命。中国人感到不得不让他们数以千计的最出色的青年去接触西方，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多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建设。

中国的变化如此广泛，如此迅速，游客从北京到上海的一路上都可以亲眼看见，即使是在安排周到的正式访问中也可以看到。

北京是个外貌暗淡、尘土很大的城市，人们关在院墙里悄悄地生活。今年夏季，外交官们看到有人穿长到膝盖以下的怪裙子。可是北京大部分居民仍然穿不分男女的毛式服装。这座城市是保守的，那里的变化来得很缓慢。

对比之下，上海则是个熙熙攘攘的港口，生活是公开的，一到晚上，小巷子里飘着刺鼻的大蒜味。南京路上处处可以看到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裙子，甚至于烫发的人也不少。妇女不化妆，也不戴首饰。但是，女性的打扮肯定又重新流行了。年轻男人开始留胡子，戴墨镜，留长发，年青男女公开手拉着手。

看来，自从毛去世后，中国生活中其它方面的变化在这两个城市中也同样出现了。文化解冻使人们可以更多地接触西方思想，中国的传统艺术也恢复了。大约有五十部西方古典作品——其中有《堂·吉珂德》、《福尔赛世家》以及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已经翻译发行。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增多了。这些影片往往是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的影片——而最近从墨西哥进口的一部片子让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式的接吻。北京和上海的电视台每天晚上播送英语讲座；比较大一点的饭店的工作人员围坐在每一层楼的电视机旁，模仿教员的牛津口音。

当江青统治文化界时，上演的文艺节目只限于八个样板戏。现在，著名的京剧团又可以演出以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传统剧目了。省里的剧团也在巡回演出各种男女相会的小剧。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连续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特色。中国人还是彬彬有礼的主人，对外国客人始终是微笑的，非常有礼貌。这对于从莫斯科去的访问者来说，是一个尤其令人感到不同的变化。俄国人在争论问题时有时候很粗鲁，或者侮辱人。中国人的方式是用最友好的态度巧妙地表示不同意见。

但是，每当中国人认为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发表强有力的讲话。目前，主要的抨击目标是四人帮，看来，大多数人对文化革命中的过火行为的反感是完全出自真心的。在医院、公社和工厂也一再可以听到人们诉说那些借口保持革命的纯洁所造成的破坏的事情。

在毛逝世之后，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表明要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只是到现在，人们才开

始私下通过在北京的消息灵通外交人士（华主席前不久访问的东欧国家的外交官）了解到这种变动的规模。他们说，在毛执政时失宠的前官员现已恢复了名誉。

一位党的官员把这些归因于中国的制度比苏联优越。他说：“毛主席宽容了他的敌人，毛懂得人头上不象韭菜。如果你把它们割了，它们就再也长不出来了。这是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教训。”

人们一定会以怀疑的态度接受这些说法。因为在上面所谈到的这一时期的很多时间里，中国是没有审判的，因此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官员丧失了生命。我想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想法难免是主观的，而且多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是封闭社会，因此要进行明确的比较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得到能够对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的相异和相同之处进行第一手研究的难得的机会，所得到的印象看来总是值得报道的。

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力量方面将仍然领先于中国。在中国，我曾两次看到人民解放军部队学习怎样拿步枪和扣扳机（没有实弹）。大多数俄国人都有电冰箱和电视机。大多数中国人则没有。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骑自行车上班。然而在有些方面中国人比苏联人强些。尽管中国实行粮食定量，但是中国大城市的商店和饭馆里的鲜肉、水果和蔬菜比俄国的要多。俄国人的粮食不定量，但新鲜食品往往也不多。在莫斯科，轴线和手纸经常缺货，而北京随时都能买到。中国制的避孕药在百货商店免费供应，品种和质量显然都超过了流产仍然是节制生育最可靠办法的俄国。

中国人的笑容比俄国人多，但是，这只有比我的经验和阅历更丰富的人才说得上中国人是不是感到比俄国人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大街上从来看不到一个醉汉（而在莫斯科却是司空见惯的），虽然中国人喜欢喝啤酒、葡萄酒和象伏特加一样烈性的茅台酒。俄国的离婚率高，中国的离婚率低。

当然，在这两个马列主义社会里，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的官员都说年轻人不信教。这两个政权都把外国人隔离在住宅区里，派武装警卫守门，不让当地人入内。两国都为党的官员提供特权享有的东西。外国人认为，中国提供给官员的特权不及俄国的吸引人，但是肯定有。今年夏天，有一对加拿大夫妇在北戴河难得地遇见中国高级官员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些青年人穿的是西式服装，用的是西德制的银质打火机。

中国人承认，他们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有些问题是一九四九年以前遗留下来的。他们也不能排除出现又一个被一批新的激进派所破坏的时代的可能性。在莫斯科，苏联领导集团正在为保持现状而挣扎着。北京由于在国内实行了广泛的改革以及实行创新的向外看对外政策，正变得越来越大胆。访问者的思想上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新上任的、比较讲求实际的领导集团是否能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以及避免重犯中国自己不久前犯过的错误。

路透社评中国的外语教学

【路透社北京十月二十三日电】为了使自己的现在比较向外看的国家加速现代化中国人下定了决心，要真正解决好掌握外语的问题。

中国计划派数以千计的理工科学生出国，而过去是只派很少出去的。它已向好些西方国家国家洽谈这件事，许多国家，例如西德、英国和荷兰已经同意接受中国学生。虽然许多中国学生被派到国外学习，但是他们的准备还需要大大改进。在北京的一位外语教师在提到一些去西德的学生时说，这些学生的德语程度实在太差，以至在饭店里要杯啤酒都不会说。然而，在国内打破外语障碍的工作已经开始。

北京电视台向全国转播英语教学，证明了业余讲座特别受欢迎。英语是中国最普遍的外语课，其次是日语、德语、法语和俄语。

仅仅在首都就售出一百多万册北京电台业余英语讲座的课本，安徽省卖了八十多万册。江苏省卖了将近七十万册。

好学的读者现在还有很多书可以看。最近在这里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安徒生童话》、《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莎士比亚全集。今年上半年，大约有九十名外国专家来到中国教授各种课程，从物理到阿拉伯语。

毫无疑问，他们很受欢迎。美国的语言学家蒂莫西·约翰斯到武汉给四百人做报告，由于听报告的人很多，只能在电视上讲，但还是有许多事情要做。三年内，中国将每年邀请一百个外国教师，现在已经编写了两套外语教材。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怎样解决把文件和蓝图从外语翻成中文的简单翻译。

例如，把一家工厂根据特许生产某些复杂机器所需要的大量资料翻译出来，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官员和工人研究这些翻译过来的资料又要六个月的的时间。

过去是不鼓励中国人同外国人交谈的。现在，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高兴地截住访问者，同他们进行某种直接交谈的练习。

陪同外国人到各地去的中国旅游翻译也急于提高最口语化的词句。这种对待外国人的气氛比较轻松，思想比较开阔的态度会造成一些愉快而又自然的接触。但往往是尽管双方都有世界上良好的愿望，障碍还是太多。